

袁森坡 吴云廷 著

7

河北人民出版社

河北通史

清朝上卷

河北

赵、中山地薄人众，
犹有沙丘纣淫乱餘民。
丈夫相聚游戏，
悲歌慷慨，
起则椎剽掘冢，
作奸巧，
多弄物，
为倡优。
女子弹弦跕屣，
游媚富貴，
遍諸侯之后宮。

冀州

冀州既载……

覃怀底绩，至于衡章。

厥賦上上錯，厥田中中。

恒、卫既从，大陆既作。

鸟夷皮服。

夹右碣石，入于河。

燕赵

畿辅 直隶

上谷至辽东

地广民希，

数被胡寇。

俗与赵、代相类，
有鱼盐枣栗之饶。

北障乌丸、夫馀，
东贾真番之利。

《河北通史》主编、副主编名单：

主 编 严兰绅

副主编 李保平

张 岗

吕苏生

夏自正

杜荣泉

目 录

绪 言.....	(1)
第一章 清代前期对直隶的统治.....	(9)
第一节 山海关之战与人民的抗清斗争.....	(9)
一、山海关之战.....	(9)
二、人民的抗清斗争.....	(14)
第二节 残酷的民族压迫.....	(18)
一、圈占土地.....	(18)
二、逼勒投充.....	(21)
三、《督捕则例》(逃人法)的推行.....	(23)
第三节 调整经济政策与恢复生产.....	(26)
一、鼓励垦荒.....	(26)
二、摊丁入亩.....	(31)
第四节 行政区划.....	(38)
一、行政机构的变化.....	(38)
二、行政区划沿革.....	(41)
第二章 口外的变迁.....	(50)
第一节 木兰围场.....	(50)
一、哨鹿行围.....	(50)

二、乌兰布通之战	(56)
第二节 口外行宫	(60)
一、行宫由来	(61)
二、行宫分布	(62)
三、避暑山庄和外八庙	(64)
第三节 口外的驿路	(67)
一、喜峰口驿路	(68)
二、古北口驿路	(69)
三、独石口驿路	(70)
四、张家口驿路	(70)
第四节 口外的城镇	(72)
一、城镇的兴起	(72)
二、塞外的城镇	(74)
第三章 农牧业	(78)
第一节 农业	(78)
一、农业生产的发展	(78)
二、口外农业的开发	(87)
第二节 营田水利	(93)
一、康熙间的营田水利	(93)
二、雍正间的营田水利	(95)
三、乾隆间的营田水利	(104)
四、井灌的普及	(105)
第三节 畜牧业	(108)
一、太仆寺马场	(109)
二、张家口外群牧处	(110)
三、礼部牧场	(110)
四、八旗牧场	(111)

第四章 手工业和商业	(114)
第一节 棉纺采矿等手工业	(114)
一、棉纺织业	(114)
二、采矿业	(118)
三、酿酒及其他手工业	(125)
第二节 盐业	(128)
一、长芦盐场的变迁和制盐技术的进步	(128)
二、长芦盐法和盐业生产	(131)
第三节 商业的繁荣	(140)
一、商品意识的增强	(141)
二、粮食贸易	(143)
三、棉花、棉布贸易	(145)
四、城乡市场的发展	(148)
五、祁州药市	(154)
六、旅蒙商贸易	(156)
第五章 社会生活状况	(161)
第一节 满蒙汉诸族杂居与融合	(161)
一、直隶地区的满族和蒙古族	(161)
二、满蒙汉各族的杂居与融合	(168)
第二节 社会生活	(177)
一、生活状况	(177)
二、赈济	(182)
三、城乡管理	(185)
四、风俗礼仪	(188)
第三节 秘密宗教	(191)
一、清茶门教	(192)
二、天理教	(193)

三、红阳（弘阳）教	(195)
四、黄天教（道）	(200)
五、白阳教	(202)
第六章 阶级关系与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	(205)
第一节 土地制度和租佃关系	(205)
一、旗地形态	(205)
二、地主土地所有制和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	(208)
三、租佃制度的形态	(212)
第二节 农业、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215)
一、雇佣劳动普遍存在	(215)
二、雇工市场及雇工工价	(220)
第三节 社会矛盾激化与人民斗争	(225)
一、社会矛盾的激化	(225)
二、人民斗争	(228)
第七章 清前期的文化	(230)
第一节 哲学、文学、方志学、教育及其他	(230)
一、哲学	(230)
二、文学	(232)
三、方志学	(235)
四、教育及其他	(236)
第二节 辉煌的建筑艺术	(241)
一、清东陵与清西陵	(242)
二、避暑山庄与外八庙	(244)
附：大事年表	(249)

绪 言

本书为《河北通史》清朝上卷，所记述和研究的是清前期河北地方的历史。

这一时期，起自顺治元年（1644年），迄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共196年。按其发展脉络，大致可分为顺治至康熙初期、康熙中期至乾隆中期、乾隆末期至道光中期三个阶段。

顺治至康熙初期，是满洲贵族向江南及西北汉人统治区的胜利大进军时期，直隶成为后方基地，直隶人民饱受满族统治者的残酷民族压迫和经济掠夺。

清朝定都北京前后，故明官吏纷纷降清，不少地方发生了由前明官吏、豪绅、儒生等策动的推翻大顺地方政权的变乱。明朝残余势力群起效尤，同满洲贵族相勾结，形成了极端仇视大顺政权的反革命联盟，反动气焰极其嚣张。大顺文武官员不是被捕放逐，就是惨遭杀害。与故明地方、豪绅反攻倒算、投降清朝相反，直隶人民不甘心满洲贵族的统治，以各种形式进行顽强抵抗，构成了对清朝的严重威胁，是为直隶人民抗清斗争的先声。此后，抗清斗争义旗高举，烽火不断。由于这些义军都是直隶本乡本土的农民，有深厚的群众基础，虽清军四出清剿，仍剿之不尽，杀之不绝，直至康熙中期仍有起义发生。这

些斗争尽管由于缺乏明确的政治纲领和强有力组织，被血腥镇压，但也沉重打击了清朝统治。

为了保持和扩大满洲贵族、官员、满蒙汉八旗将士的政治、经济特权，满足其奢侈享乐，从顺治元年（1644年）起，清政府令八旗将士在直隶大规模圈地，并诱使、胁迫汉人带地投充入旗。圈地令名义上说是把近京各州县无主荒田分给东来的诸王、勋臣、兵丁人等，实际上却是大肆侵占直隶汉人住房产业，而不论有主无主。“圈田所到，田主顿时逐出，室内所有皆其有也。妻孥丑者携去，（旗人）欲留者不敢携。其佃户无生者，反依之以耕种焉。”^①“以致丁男流离，城郭为空”^②。此外，八旗贵族、官兵还借口土地瘠薄，不断新圈拨换，仅顺治四年（1647年）正月一次圈占的直隶41县肥地就多达99.3707垧，合5.9622万顷。加上以后二次圈占的民田，包括实际上已归耕农所有的故明国舅、皇亲、驸马、公、侯、伯、太监坐落在直隶的土地，共达16.6万余顷。其中有划归皇室的内务府皇庄庄田1.2万余顷，宗室庄园1.3万余顷，八旗官兵旗地14.09万余顷。虽然康熙八年（1669年）清廷已下令禁止圈地，但实际上一直到康熙二十四年清廷下达永停圈地诏令时才基本结束。在从顺治元年到康熙二十四年的40多年里，清皇室和八旗官员圈占、接受投充的畿辅民地总数约计25万顷。以后八旗兵退地领饷，直隶还有13.891972万顷土地被圈占。被圈占土地上的农民失去了祖祖辈辈辛勤耕耘的土地，也失去了房屋、家具、牲畜，只好卖妻弃子，流落异乡。

在大肆圈占土地的同时，满洲、蒙古、汉军八旗还肆行收

① 史樟：《恸余杂记》，《圈田》。

② 康熙《雄县志》卷上。

纳投充。投充者中有的是自耕农、小土地所有者。他们失去了本来就不多的土地，饱受生活的煎熬，既不甘心转死沟壑，也不敢反抗，无奈投到旗下，世代为奴。还有一些中小地主，担心自己的土地被无代价地圈占，自愿投充入旗。他们在八旗旗主的卵翼之下，既是旗主的奴仆，又是壮丁们的二地主。还有一些横行于乡村的“狡黠之徒”，先是指称别人的土地为自己的土地，冒名投充，然后又倚仗旗主特权，为非作歹。满洲旗下的庄头、奴仆也狐假虎威，凭借着主子的权势逼迫别人投充。总计，带地、无地的投充人共 49943 丁。大量国家的土地以投充的形式转到了旗主手中，清朝的赋税收入明显减少，亏空自然转嫁到无地、少地的农民身上，导致农民大批逃亡。清政府虽也下令禁止投充，但满洲贵族受利益的驱动，依然故我，使禁令成为一纸空文。

清初，八旗贵族通过战争俘掠、买卖人口、强迫投充、籍没为奴等手段，占有大批奴仆。奴仆们遭受着满洲、蒙古、汉军八旗主子敲骨吸髓般的凌辱、践踏和盘剥，反抗、自杀、逃亡之事不计其数。为防止奴仆逃跑，清廷特设兵部督捕衙门，制定了残酷的惩办逃人及窝主的《督捕则例》。特别是对窝主的惩治比对逃人更加残酷，株连极为广泛，造成了社会巨大的动荡。

康熙中期至乾隆中期，是清前期直隶历史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一时期，由于统治者逐渐放弃了刚入关时的暴虐政策，采取了一系列与民休息的措施，清王朝进入大统一大发展的阶段，逐步形成了所谓的“康乾盛世”，直隶地区的社会经济也得到了全面的恢复和发展。

清初一系列倒行逆施，激起直隶各地农民的强烈反抗，严重地威胁着京畿的封建秩序。统治者慑于“载舟之水，反而覆舟”的历史教训，不得不在维护八旗贵族政治经济特权的前提下

下，采取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措施。难以自保的汉族农民得以在小块土地上耕作谋生。引起社会动荡不安、冤狱遍地的逃人法逐步有所松弛；清廷陆续采取了诸如把旗丁同民户共编保甲、禁止庄头增租夺佃等限制旗人特权的措施，满汉之间的尖锐矛盾有所缓和。此外，满洲统治者还实行奖励垦荒、蠲免和赈济、更名田、盛世人丁永不加赋、摊丁入地等鼓励人民发展生产的措施。

玄烨及其子孙调整政策之后，直隶的田亩和人口有了较快增长，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获得了较大发展。农业生产技术、耕作条件、单产等都有了不少改进和提高。高产作物水稻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玉米种植在乾隆以后甚至推广到了口外。耐旱、瘠、高产的红薯在乾隆时引入直隶，到嘉庆、道光时直隶大多州县都有了种植。这对于提高粮食产量，缓和吃粮紧张，具有重大影响。在种植业中，经济作物棉花生产的发展也是非常突出的。清前期，直隶已成为全国最重要的产棉区之一，除宣化府地处严寒不产棉花以外，其他各府州基本上都有棉花生产。棉花的普遍种植带动了家庭纺织业的进一步发展。耕织结合的家庭手工业在直隶各地十分普遍，出现了一些著名的纺织品产地，如束鹿、高阳、南宫、景州、乐亭杨各庄、永年等。纺织技术有了明显进步，产品质量大有提高，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各种矿产得到进一步开发，特别是北部的永平府和承德、宣化等府尤为突出。制盐技术有所改进，盐产量大幅度提高，行销范围更加广泛。其他如酿酒、造纸、陶瓷、编织等也有一定发展。

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农业经济作物专门化与手工业行业分工的加强，商品交换进一步扩大。进入流通领域的商品十分广泛，主要是粮食、棉花及棉纺织品。由于各地水土条件有好有差，年景有丰有欠，生产情况好时出售余粮，差时购进。

直隶粮食贸易多属互通有无、调剂余缺性质。在棉花集中产区，粮食不能自给，多从外地购进。棉花贸易不仅限于本省，还行销华北各省，甚至卖到了朝鲜。商业性的果园业经营也较突出，出现了不少名产，如沧州枣，赵州、交河梨，肃宁、深州桃等。棉纺织品的交易在市场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远销山西、辽宁以及宣化、承德等地。由于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商品交换范围的扩大，城乡市场也有了很大发展。集市分布相当广泛。在村落集市发展的基础上，涌现出了不少贸易比较繁盛的小集镇。集镇中不只是村落集那样比较单纯的形式，而且交织着生产者、消费者、经营者之间错综复杂的交换关系。交换内容和流通渠道也呈现出多样性。祁州（治今安国市）庙会已成为全国性的、以药材为主的货物集散中心。旅蒙商贸易的发展，不仅给口外蒙古地区带去了货物，还带去了商品经济的影响。使蒙古地区单一的畜牧生产的经济形态，逐渐向以畜牧生产为主，兼有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贸易等多种成分的经济形态发展。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的活跃，资本主义萌芽也在缓慢生长着。由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农村贫富分化的加深，以及农民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已有越来越多的破产者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流向他处。这些人有的从事商业贩运和手工业，大量的是受雇于大地主和手工工场主。无论农业还是手工业，使用雇佣劳动的现象相当普遍，使用雇工的规模也较大。有的人当雇工不仅仅局限在本地，而且还到达很远的地方。适应普遍存在的雇佣劳动，各地还出现了雇工市场。

同明代相比，清前期直隶发展的最大特点是口外地区得到了开发。清初，直隶口外东部分别属于内蒙古卓索图盟和昭乌达盟。康熙初年，清廷将察哈尔八旗由义州（治今辽宁义县）西迁至宣大塞外。直隶口外西部属于察哈尔正黄旗（一半在直

隶)、镶黄旗、正白旗、镶白旗、正蓝旗。禁止圈地之后，允许在口外为无地旗人划拨土地，一批八旗官兵和宗室庄田纷纷设立。与此同时，直隶和山西、山东大批逃荒的汉族农民也蜂涌出口，到那里垦荒和经商，逐渐成为口外居民。满、蒙、汉族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互相交流，互相融合，共同开发，使昔日的“龙沙雁碛之区”，一步步变成了“筑场纳稼，烟火相望”的农牧业基地，崛起了以张家口、承德为代表的城镇。交通、商业交流也进一步发展。通过清政府开拓的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张家口等4条驿路，直隶与黑龙江齐齐哈尔，内蒙古各盟、旗，外蒙古恰克图、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地联系起来，一直远达新疆南北、沙俄等地。随着口外经济文化的发展，行政机构的设置也逐步完善，奠定了今天河北行政区划的格局。

乾隆末期至道光中期是清前期直隶历史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是清王朝由盛转衰的阶段，社会矛盾日益激化，人民斗争此伏彼起。

同历代封建王朝一样，清代社会矛盾激化是人祸与天灾交相煎迫的结果。人祸之中，最为严重的是皇帝的奢侈。清代皇帝的生活相当奢侈，以弘历(乾隆帝)为最甚。他的居所陈设、日常饮食、生日铺张，都是榨取的民脂民膏。其次是官吏的贪婪。上至朝廷大臣，下至督抚司道州县，贿赂公行，层层剥削，象无数吸盘吸在老百姓身上，使得人民生活极为困苦。第三是土地兼并严重。直隶是清朝的心腹重地，是满、蒙、汉八旗勋贵聚集的地区。他们大肆圈占土地，倚权仗势侵占民田，形成了旗庄密布，田连阡陌。而大批农民却成了无立锥之地的无业游民。顺、康时期，直隶的水、旱、蝗、雹、风沙、霜冻等自然灾害相当频繁。乾隆中期以后，因政治腐败，贪官如蚁，农

民的贫困破产，使人们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更低，水、旱、蝗灾猖獗。

由于受皇帝奢侈、官吏贪黩、土地兼并以及严重自然灾害的交相煎迫，直隶人民生活极其痛苦。爆发了抗粮、夺粮、反科派等多种形式的反抗斗争。秘密宗教得以进一步传播，并成为农民起义的一种组织形式。特别是以林清、冯克善、李文成为首的天理教起义，林清一支攻入紫禁城，直逼隆宗门，极大地震撼了清朝的统治。

清前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封建国家积累了雄厚的财力、物力，也为统治者大兴土木、营造宫殿、园苑、陵寝提供了物质条件。于是，直隶境内崛起了三处规模宏大、气势雄伟的建筑群，即清东陵、清西陵、避暑山庄和外八庙。这三组建筑的规划、设计和施工，既继承了前代的优秀成果，又因地制宜，有所发展和创新，是清代辉煌建筑艺术的代表。

这一时期，直隶还涌现出一批颇有影响的文化代表人物，如以曹雪芹、纪昀为代表的文学家，以颜元、李塨为代表的哲学家，以崔述为代表的经学家，以王清任为代表的医学家等。为培养封建官吏，用儒家思想统治人民，清政府还相当注意兴建学校，出现了一批富有特色的、以保定莲池书院为代表的教学机构——书院。清代十分重视纂修志书。顺治至道光期间，直隶纂修地方志约300种，保存了大量珍贵资料。

在清代前期直隶的发展史中，直隶口外的开发具有重大意义，是这一时期的一大特点。在本书中，我们着力反映了这一特点。北京、天津在清代属直隶省，现在则直属中央，在编写本书时，我们尽量以现在的行政区划为准，选材侧重河北，有关京、津史料不用或少用。

本书由袁森坡、吴云廷合作编写。第一章第一、二、三节，

第二章，第三章第三节，第五章第一节一目，第六章第三节，第七章第一节第一、二、三、四目、第二节由袁森坡编写；第一章第四节，第三章第一、二节，第四章，第五章第一节二目、第二、三节，第六章第一、二节，第七章第一节二、四目，大事年表，由吴云廷编写。《绪言》为二人共拟。

由于时间及作者水平的限制，书中难免有材料遗漏、选择不准和推论错误之处，敬祈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第一章 清代前期对直隶的统治

第一节 山海关之战与人民的抗清斗争

一、山海关之战

国内政治形势的剧变 顺治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明朝灭亡，国内政治斗争的形势迅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来农民起义军、明朝、清军三种势力长期角逐，农民军和清军都是以明朝为对手，清军与农民军虽然没有直接联系，但清军历次入关作战时都避免与农民军发生冲突。为了削弱明朝的军事力量，清朝还幻想与农民军结成共同消灭明朝的军事联盟。这年正月，内蒙古鄂尔多斯封建主向清朝奏报：“中原流寇势愈猖獗，攻陷陕西郡县，渐逼边境。”清摄政王多尔衮立即遣使西行，以大清国皇帝的名义，向已经“西据明地”的农民军致书：“欲与诸公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混一区宇，富贵共之矣。”^①以后，清朝的态度骤变，因为清朝认定明朝的统治已是无可救药，农

^① 《清世宗实录》卷3：《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第89页。

民军才是与清朝争夺天下的主要敌人。是年四月初，盛京还没有听到明朝灭亡的消息，清大学士范文程即向多尔袞上书，建议多尔袞立即挥师入关，先占领河北。不久，农民军占领北京的消息传到盛京，多尔袞将在盖州（治今辽宁盖县）汤泉养疴的范文程召回盛京参与决策。范文程认为，应当利用明朝地主阶级对农民军的仇恨情绪，立刻进兵。范文程的两次献策，均被多尔袞所采纳，成为清兵入关时的大政方针。多尔袞旋调动清军，准备进入中原。

农民军政策的重大失误 清军虎视眈眈，准备向关内进发。这时，占领北京城的农民军领袖们却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看不到清兵大举入关已迫在眉睫，看不到满汉地主阶级相互勾结、联合进攻的危险，忙着筹办登基大典。将领们也占甲第、贪钱财、讲排场、求享受，以至于斗志低落，军纪涣散。在斗争的策略上，农民军对贵族官僚追赃比饷是必要的，但被拷打追赃的多达 800 余人，“阁臣责饷十万，部、院、锦衣七万以下，科、道、吏部五万以下，翰林二万以下，部属以下各以千计，勋戚则金尽辄杀之。”^①“拷掠责赇，至灼肉折胫”^②。首恶与从恶不分，刑法太重，打击面过宽，把可以争取或中立的力量也推向了敌对阵营。不久，吴三桂煽动明朝官僚地主反攻倒算的檄文传来，形势遂急转直下。

吴三桂向清朝请兵 吴三桂原任明朝辽东总兵，驻守于宁远（治今辽宁省兴城县）。他是明末大官僚大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也是一个阴险狡诈、反复无常的野心家，“部下有精兵四万，辽民七、八万，皆耐搏战，而彝丁突骑数千，尤为雄悍。”^③ 李

① 《明鉴纲目》卷 16 《庄烈帝》。

② 夏燮：《明通鉴》卷 90 《庄烈帝崇祯十七年》。

③ 《明鉴纲目》卷 16 《庄烈帝》。

自成自山西经大同向北京进攻，崇祯帝令其放弃宁远，率所部救援北京。三月上旬，吴三桂放弃明朝在山海关外仅存的宁远、沙后所两城，率领辽东军民于十六日后陆续进关，暂屯于昌黎、滦州（治今河北滦县）、乐亭、开平一带。这时，李自成已兵不血刃，接受明大同总兵姜瓖、宣府总兵王承胤、居庸关守将蔚镇总兵唐通的投降，兵锋直指北京。在夺取北京前，李自成考虑到吴三桂与山海关总兵高第共有精兵五万人（高第所部为一万人），“遂遣兵政左侍郎左懋泰偕（唐）通守山海关。通遗三关书，盛夸（谔）李自成礼贤，啖以父子封侯。”^① 其时吴三桂听说崇祯帝已死，乃由丰润退守山海关观望形势，见李自成招降，乃曰：“闯王势大，唐通、姜瓖皆已降，我孤军不能自立……乃报使于自成，卷甲入朝。”^② 山海关的防务，交给了唐通。一路之上，吴三桂还大张告示：“本镇率所部朝见新主，所过秋毫无犯，尔民不必惊恐。”^③ 为了跻身于大顺王朝的新贵之列，吴三桂表现了很高的主动性。二十四日走到永平，又过了一两天走到玉田，吴三桂听说其父吴襄被农民军拷打追赃，索饷二十万；爱妾陈沅（圆圆）又被李自成的大将权将军刘宗敏夺去，不禁怒火中烧，乃率兵杀回并攻占了山海关，击败了农民军派驻的守关将领唐通。随后，吴三桂急忙遣使向清军求援，同时宣称要为崇祯帝复仇，发布檄文，煽动官僚地主起兵叛乱。

清兵入关与石河血战 四月十二日，李自成下令亲征。十三日，李自成亲领马步二十万人出正阳门，并带明太子、定王、永王、吴襄随行，以便再次争取吴三桂投降。大顺军经通州、密云、永平，十九日挥师直指山海关。

① 《清史列传》卷 79《唐通》。

② 彭贻孙：《平寇志》卷 10。

③ 《辛巳丛编》载《吴三桂纪略》、《平吴录》。